

# 皇帝的边塞诗

——《大同》之二十三

侯建臣

云中故郡，在内蒙古托克托一带，曾经的高墙厚垒，已成废墟，上面布满了杂草。

鹿塞鸿旗驻，龙庭翠伞回。  
毡帷望风举，穹庐向日开。  
呼韩顿颡至，屠耆接踵来。  
索辫擎猪肉，韦鞬献酒杯。  
何如汉天子，空上单于台？

公元607年对于刚刚登基不久的大隋皇帝杨广来说，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年份。一直活动于中国北方，让此前历朝历代不少皇帝头疼的突厥，分裂为东西两部，其中东突厥已经厌战，也可能是胳膊腿不硬，让其那部族欺负得不行，启民可汗带领他的属下主动归附了隋朝。这件事对于善于应付北边战事的隋朝来说，绝对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；对于公元604年才即位的隋炀帝杨广来说，也完全可以算是意外收到的一个大礼包。肯定是，兴奋让他好几个、好几十个夜晚难以成眠，辗转反侧。说起突厥，杨广是熟悉的，就在开皇二十年，也就是公元600年，他曾以皇子的身份率军打退过犯边的突厥。

关于隋炀帝杨广，许多人是从那部《隋唐演义》知道的，且人们一谈起他，就跟昏庸残暴挂起钩来。其实，杨广是一个颇具魄力的皇帝，他率军灭掉陈朝，平定江南叛乱，帮助父亲杨坚建立了隋朝。他登基以后，营建东都，开凿运河，推动南北交流；革新官制，改进文

教，促进社会发展。特别是他首创的试策取士制度，开启了中国科举制度的模式。他还亲巡西北陈兵讲武，先后三次派人前往流求（今台湾）。这些足以看出他的与众不同。

天下初定，有族来附，且是北方强族，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来说，不兴奋是不可能的。估计是，在群臣山呼万岁的祝贺声里，杨广站在都城的皇宫大殿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：“朕要北巡。”

地处边陲的云中大地，即使已经进入了春天，依然有着料峭寒意，且天气变化无常。正所谓“三月三，红罗凉帽单布衫。四月八，皮袄皮裤不敢脱。”对于这相对偏远的地区来说，皇帝亲临，真不是一般的大事，这样的事情也曾经有过。那一次跟这一次不同，汉高祖不是巡视扬威，而是带队北伐。当然了，最终结局也不一样，刘邦被匈奴大军包围在白登山上，忍冻挨饿，饱受屈辱，最后用了陈平的计策，贿赂单于后官才得以免脱，灰溜溜地南返。隋炀帝不是，当时的杨广春风拂面，意气风发，走在北巡的路上，看着北方的大好河山，也许还不时哼几句平地里跟妃嫔们在皇宫吟唱的小调。当然了，诗言诗发也是必然的，毕竟杨广是一个才情横溢的皇帝，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皇帝，像杨广一样文武双全的还真是不多，汉武帝刘彻算一个，唐太宗李世民算一个，清康熙帝玄烨算一个。在有花有月的夜晚，面对春江，杨广能吟出“暮江平不

动，春花满正开。流波将月去，潮水带星来”和“夜露含花气，春潭漾月晖。汉水逢游女，湘川值二妃”。看着萧瑟的原野，杨广能吟出“寒鸦飞数点，流水绕孤村。斜阳欲落处，一望黯消魂”。当然了，他的诗还有很多。北魏第三任皇帝，那位统一北方的太武帝佛狸有一个爱好，只要到一个地方，就要竖起碑石，以示纪念。而杨广先生，却是喜欢将蓬勃的诗情挥洒到足迹所至的山河、风云之中。

杨广以前就来过北方，那时的情景尽管与现在不同，主要是与犯边的突厥交战，但杨广仍然写出了《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》的长诗：“肃肃秋风起，悠悠行万里。万里何所行，横漠筑长城。岂台小子智，先圣之所赏。树兹万世策，安此亿兆生。巨敢憎焦思，高枕于上京。北河乘武节，千里卷戎旌。山川互出没，原野穷超忽。攒金止行阵，鸣鼓兴士卒。千乘万骑动，饮马长城窟。秋昏塞外云，雾暗关山月。缘岩驿马上，乘空烽火发。借问长城侯，单于入朝谒。浊气静天山，晨光照高阙。释兵仍振旅，要荒事方举。饮至告言旋，功归清庙前。”

这一次，杨广的北巡车队入山西，经雁门、马邑抵达古榆林，居住了一个月左右，在八月份又从榆林出发，直达云中，五十万披甲士兵和十万匹战马铺陈在北方的大地，鲜艳的旌旗在暖风中随意飘扬。特意制作的观风行殿下安着轮子，既可以拼到一起，又可以分

分开行走，让突厥人以为看到了神一般，大老远就屈膝稽拜。在启民可汗早早准备好的庐帐里，王侯以下的官员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，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来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杨广的诗情又一次涌了上来，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一首《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》便从他的嘴里缓缓地吐了出来，像是早就在腹中酝酿了好久的，又像是纯粹属于即兴之作：

鹿塞鸿旗驻，  
龙庭翠伞回。  
……

杨广的声音在高大的穹庐内回旋，杨广的诗意在历史的长廊激荡，成为那一年北方的绝响。若干年后，当年的人事已成往事，而这首诗却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字里行间定格成永恒。

也许是在都城待不住，也许是仍然担心北方安危，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608年，杨广再次北巡，游览了方山，拜谒了灵岩寺，并赋《谒方山灵岩寺诗》一首：“梵宫既隐，灵岫亦沈沈。平郊送晚日，高峰落远阴。回瞻飞曙岭，疏钟响昼林。蝉鸣秋气近，泉吐石溪深。抗迹禅枝地，发念菩提心。”



# 湖畔马影

杨刚

晨雾缥缈，大同湖碧波荡漾，湖边草本植物鲜嫩欲滴，林地边缘灌木浆果满枝。远处的六棱山淡淡地隐在雾色氤氲中，山脚下的火山锥静静矗立，黑褐色的玄武岩岸线蜿蜒伸展……在如同山水画的景致中，一阵蹄声由远而近，数百匹普氏野马扬鬃奔来，它们的身影映在澄澈的湖水中。这是数十万年前的大同盆地。

那时的华北北部还没有呈现今天大同盆地的地貌格局，而是一片浩瀚的水域横亘，地质学上称之为“大同湖”。这片由地壳断陷与火山活动共同塑造的古湖，鼎盛时期水域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里，今日大同市区及浑源、阳高、天镇、广灵等县，朔州市城区、怀仁、山阴、应县以及河北省阳原、蔚县的一部分区域都是“水乡泽国”。草原、湿地、林地等形成复合型生态系统，也为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

当然，那时许家窑人的烟火还没有升起，人与马还没有碰面，文化还无从谈起。

考古学家在今天大同六棱山的坡地岩层中发现了密集的植物化石，证明这里曾是野马理想的栖息地。根据出土的化石判断，当时大同湖畔生活着至少三百匹普氏野马，它们与野驴、野牛等动物共同构成了食物链的核心环节，也为即将登场的人类埋下了命运的伏笔。

十万年前的某一天，一群身影出现在大同湖畔。他们是许家窑人，早期智人的重要代表，额头微隆，眉骨粗壮，有着远超直立人的脑容量与智慧。他们赤足踏过湿润的湖泥，手中紧握着打制的石球，目光警惕地投向湖畔饮水的野马群。这是人类与马在大同湖畔的初次邂逅，从此开启了一段延续万年的羁绊。

位于阳高县东部梨益沟河谷西岸的许家窑遗址出土的4300余枚马类牙齿化石，见证了这种羁绊的深度——它们分属300多匹野马个体，从初生幼驹到年迈老马，完整呈现了野马种群的生命轨迹，也诉说着人类对这一物种的深度依赖。

古气候学研究显示，许家窑人生活的中更新世晚期，大同湖区域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周期，年平均气温较现在高出3到5摄氏度，适宜的温度与充沛的降水让湖边草本植物生长旺盛，为食草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。正是这样的地理与气候背景，使大同湖成为普氏野马等动物的重要栖息地，也为早期人类的定居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中国科学院考古学家贾兰坡、卫奇等在阳高许家窑村梨益沟展开考古发掘，一处震惊学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即许家窑遗址面世。遗址中出土20件人类化石，代表了从儿童到老年的16个个体，这就是“许家窑人”。

许家窑人选择大同湖畔的山坳与坡地构建营地，既便于获取湖水与食物资源，又能借助地形抵御天敌与寒冷。许家窑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文化遗存清晰展现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模式：石器制作工艺趋于成熟，尤以石球为典型代表；狩猎活动高度专业化，野马成为其核心狩猎对象。这些遗存印证了许家窑人作为“猎马先民”的鲜明身份，也揭示了他们的独特生存策略。

当时的许家窑人脑容量已达到1700毫升左右，接近现代人类水平，这为他们发展复杂的狩猎技术与群体协作提供了生理基础。他们亦赤足踏过湖畔的泥沼与砾石，以群体为单位活动，形成了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。遗址中集中分布的用火痕迹、石器加工区与动物骨骼堆积，表明许家窑人已形成相对固定的营地模式。野马资源的稳定供给，正是支撑这种定居生活的关键因素。

许家窑人被考古学家称为“猎马人”，原因就在于他们已有发达的狩猎文化。许家窑遗址出土大量石球与野马化石。考古学家将出土的1000余件石球根据重量分为大中小三类：大型石球重1501-2500克，中型为501-1500克，小型仅50-500克。这些石球的制作工艺展现出高度的标准化与专业化，原料取自大同湖畔的坚硬砾石，经砸击、打磨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，球形度指数高达0.9，与完美球体极为接近，部分石球表面还保留着清晰的打磨痕迹，见证了制作过程的精细。

这些石球是许家窑人狩猎野马的核心工具，其使用方式主要有两种：小型石球被装入兽皮兜中，两端系绳制成“飞索石”，猎手抡起后松开一端，石球可在50至60米范围内精准飞出，借助离心力撞击野马的腿部或躯干；大型石球则系于木杆末端，形成“绊兽索”，抛出后可缠绕野马四肢，使其失去奔跑能力。仿制实验表明，这种工具在20米内的命中率超过70%，动能足以击倒成年野马。

与石球相伴出土的是数量惊人的野马化石。遗址中共发

现4300余枚马类牙齿化石，分属至少300匹野马个体，涵盖了从初生幼驹到年迈老马的完整年龄谱系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显示，许家窑人对野马的狩猎具有明确的选择性：早期（下文化层）可能通过捡拾自然死亡个体、抢夺食肉动物猎物与主动狩猎等多种方式获取资源；到了晚期（上文化层），主动狩猎成为主要方式，且更偏好捕猎3到6岁的壮年野马——这一年龄段的马匹脂肪与肉量最丰，狩猎风险相对较低。这种有选择性的狩猎策略，表明许家窑人已对野马的种群结构与生活习性有了深刻认知。

狩猎野马的过程，是许家窑人群体协作的集中体现。他们通常以10到15人一组，在黎明或黄昏时分埋伏于大同湖畔的芦苇丛或林地边缘，利用野马饮水、觅食的规律实施捕猎。许家窑人首先通过低沉的信号指挥行动，数名猎手同时抛出飞索石或绊兽索，其余成员手持尖石片围堵，形成严密的狩猎包围圈。一旦野马倒地，猎手们就迅速用石片切断其颈动脉，避免猎物挣扎消耗能量，随后将猎物拖回营地处理。这种高度协同的狩猎模式，不仅需要个体的技术熟练度，更依赖群体的默契配合，是许家窑人智慧的集中彰显。

许家窑人与野马的关系，远不止于“狩猎者与猎物”的简单对应，而是形成了深度的共生互动，这种互动既塑造了许家窑人的生存模式，也影响了野马种群的演化轨迹。从物质利用层面来看，野马几乎成为许家窑人生活中的“全能资源”：马肉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，支撑他们在寒冷气候中维持体力；马皮经鞣制后成为衣物与帐篷的原料，遗址中发现的兽皮印痕上，仍能辨认出细密的毛纤维；马骨被加工成工具，股骨可作为挖掘根茎的耒，肋骨磨制成骨针，用于缝制衣物；甚至马的内脏与骨髓也被充分利用，骨头表面的敲砸痕迹证明许家窑人懂得吸食骨髓补充营养。

在生态演化层面，许家窑人的狩猎行为对野马种群产生了显著影响。考古研究发现，随着许家窑人狩猎技术的精进，野马种群的敏捷性与警觉性不断提升，出土化石中年轻个体的比例不断增加，表明野马种群通过自然选择朝着更具逃生能力的方向演化。而许家窑人也在与野马的长期互动中不断优化自身策略：从早期的被动捡拾到晚期的主动狩猎，从单一的工具使用到复杂的群体协作，这种双向的适应与调整构成了人与动物共生演化的典型样本。

中更新世晚期，全球气候出现冷暖交替的波动，大同湖经历了从温暖湿润到寒冷干燥的转变，湖面面积逐渐缩小，草原向荒漠过渡。环境变化导致野马栖息地碎片化，种群密度下降，这迫使许家窑人不断改进狩猎技术：石球的尺寸逐渐变小，制作更加轻便，以适应更广阔的狩猎范围；狩猎群体的规模从十余人扩大到数十人，以提高捕猎成功率。许家窑遗址晚期文化层中野马化石数量的增加，证明许家窑人在环境压力下，通过技术创新与策略调整，依然维持了对野马资源的稳定获取。

除了物质层面的依赖，许家窑人与野马之间或许还存在着精神层面的联结。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，野马的速度与力量必然令人类心生敬畏。部分石球表面刻有简单的线条纹饰，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对马奔跑姿态的模仿；营地中发现的野马头骨化石，往往被摆放在显眼位置，可能是某种原始崇拜的象征。这种对马的敬畏与依赖，不仅是生存需求的反映，更可能是后世中华文明中马文化的滥觞，为“马”所承载的力量、进取与忠诚等精神内涵埋下了远古伏笔。

时光流转，气候改变，大同湖的碧波退去，化作今日桑干河流域的平原与丘陵；许家窑人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，只留下遗址在沉默中诉说着远古的故事。

不过湖畔的马影从未真正消失——它们化作考古发掘中的化石遗存，化作文明传承中的文化符号，化作中国人对马的深厚情感，在岁月长河中不断回响。无论是寻访许家窑遗址还是参观大同市博物馆，我们深知，大同盆地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，许家窑人用石球与智慧书写的“人马传奇”不仅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重要篇章，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远古源头。

迎来的又一个马年，禁不住回望数十万年的时光飞逝——从许家窑人的石球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马文化，从大同湖畔的共生图景到今日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，这段跨越沧海桑田的人马羁绊始终贯穿着相同的文明内核：对自然的敬畏与适应，对技术的创新与运用，对群体的依赖与协作。许家窑人的人与马共生传奇或已融入我们的集体记忆，在后世文明发展中一直默默地发挥作用，只是我们从未深度留意。

马·大同



破寒而舞

孔祥秋摄

# 幸福的春节

张宏

了名的好。“她姨姨，忙完这阵儿，可得来我家搭把手压粉呀！”前排邻居的喊声刚落，后排的木门又吱呀作响，“她姨姨，等你闲了，帮俺家也压点呗！”妈妈总是笑着应承：“好嘞，这就来！”

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，妈妈在各家各户间连轴转，帮邻居压完粉条，才转头打理自家的年事。厨房里，油锅滋滋作响，麻花的香甜在空气中弥漫；蒸锅里，白胖的馒头在蒸汽中慢慢鼓起，带着麦面的清香；案板上，爸爸早已备好馅料，夫妻二人默契配合，炸丸子、炖鸡、做扒肉菜，肉香顺着窗棂飘出，引得巷子里的孩童频频驻足。

忙里偷闲时，妈妈还会拿出新买的布料，在灯下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新衣服、纳鞋底，细密的针脚里，藏着最朴素

的疼爱。而爸爸则挥毫泼墨，为邻里书写红彤彤的春联，笔墨间的期许，映着家家户户对好日子的向往。那年的春节，因着父母的辛勤付出与邻里间的和睦温情，成了心底最难忘的幸福印记。

岁月流转，如今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我已在养老院度过了十八个春节。养老院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，大家在这里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，亲如一家。我们养老院的春节张灯结彩，吃饺子、唱歌、扭秧歌，其乐融融。

这些年，逢年过节，市残联、区残联的领导们多次登门看望慰问，握着我的

手嘘寒问暖，关切地询问生活起居。他们带来的，不仅有崭新的轮椅、合身的衣物、温暖的被褥、贴心的大红包，更有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牵挂。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暖意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，这份温暖，如同冬日里的暖阳，驱散了岁月的寒凉。

从童年大杂院里的烟火邻里情，到如今养老院的温情关怀，不同的时光，不同的场景，却有着同样的幸福底色。童年的幸福，是父母忙碌的身影与邻里间的守望相助；如今的幸福，是党和政府的牵挂与社会的温情呵护。原来幸福从未走远，它藏在岁月的褶皱里，在每一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，静静流淌，温暖如初。这跨越时光的幸福，让每一个春节都意义非凡，值得永远珍藏在心里。



来都变成了黑的，吃都没法吃了。等到了年夜饭时，我们到街头看大人们响炮仗放烟花，此情此景，一直持续到凌晨，眼皮下眼皮一直打架，实在是困得不行了，这才依依不舍地回家睡觉。

到了正月初七八，街上有了红红火火的高跷队、秧歌队、大头娃娃，我们不辞辛苦地跟着看，有时候看到很晚了才回家，累得倒头就睡，第二天，兴致依旧盎然。

如今的我们已是年老体弱，儿时的记忆如一场电影，在眼前回放，当年的快

乐情景历历在目。想起那时候的时光，就像是昨天一般。时光流转，口音不再是儿时的样子，院子里的老邻居有搬走的，有离世的，儿时的玩伴也都是老年人了，想想那时候，我的母亲才三十多岁，如今的我们都是奔七十的人了。

又一个春节快要到了，没有了小时候盼过年那样的急切心情，但心中的祈愿未曾改变，愿今后的日子能够健康康快快乐乐的，也祝愿儿时玩伴们的老年生活幸福安康，愿我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，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，万事如意！

# 儿时过大年

孟菊萍

小的时候，还没放假，就开始盼着过大年了。

那时候，我们住在口泉街，院子不算很大，住着八九家人，但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孩子挺多，差不多有十来个。日盼夜想中，年终于到了。除夕的早上，我们早早地起来洗漱，吃过饭，换上新衣服，便这家进去、那家出来地结伴玩耍。

母亲是家庭主妇，没有工作，那时的她又年轻又有精力，家里的活儿不用我们干，我们只管吃、喝、玩儿，童年的时光，非常开心和快乐。

到了除夕的中午，家家户户都贴上了对联，挂起了灯笼，院子里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，满院子的喜庆。大人们忙着做好吃的，好喝的，我们这些孩子们，穿着新衣服，拿着小鞭炮，串来串去，玩得亦乐乎！

当年的情景，如今想起来仍觉得兴奋，那时候的我们无忧无虑，不愁吃不愁穿，不担心作业没做完，不担心家里有活没干，我们只管开心地玩耍。

除夕的晚上，更是开心时刻。我们早早地吃了饭，之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玩扑克，手里的水果糖赢来输去，到后